

从生活儒学到生生之学

——读李承贵教授《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章 林*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联署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在中国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际，宣称要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所谓肯定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之存在，即是说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生命力，能够作为现代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传统文化生发的原初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其生命之活力必须通过移嫁培育之功方能再现。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风雨飘零而又一线生机未绝。宋明儒家常谈一阳来复，当代新儒家期盼贞下起元，而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活力渐起，几代学人之坚守始见成效。李承贵教授新著《儒学的义理与敞开》（孔学堂书局2022年版，以下凡引用本书仅标页码）正是一个鲜活的个例，展现了当代儒学研究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浸淫儒家典籍，梳理儒学义理，落实儒学价值的思想历程。在李教授的新著中，我们既能看到几代学人一贯的坚守，更能看到当代学者开创的新局面，展现的新气象。

* 章林，男，哲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一 全面评估儒学的当代境遇， 展现高度的理论自觉

要传承和转化传统文化，首先需要对其困境和生机都有清醒的认识。李教授对儒学的危机和生机都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当代儒学研究者的价值和任务，展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李教授概述了儒学当代困境的五种表现，认为“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缺失了它早先赖以生活的条件”（第405页），传统的宗法社会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以及族规乡约制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均被改革或废除，此即儒学“存活的困境”。儒学存活之困境是其在当代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基础，李教授对各种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又对儒学化解危机和困境抱有信心，儒学虽然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根基，但其自身所具有的“普适性”使其能够顺应古今之变，在当代重获新生。儒家思想的普适性首先来自思想自身的“本体性根据”，即：“人的实践及其需求的同质性，决定了人类创造的思想、学说的普适性，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群体根据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实践创造的学说、思想体系，它自然具有普适性。”（第350页）实际上，儒家对其所追求的“道”和“理”的普适性有强烈的认同，这反过来又塑造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学说体系。李教授认为儒家思想的普适性“本质上是建立在儒学主体对人类生活实践的反思、检讨和总结之上的，是建立在思想逻辑与实践逻辑永远的互动之上的”（第353页）。即是说，儒家思想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神圣性”和“完美性”，而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反思与实践进行永不停息的互动。

李承贵教授对儒学在当代的困境和生机均有深刻的认知。儒学生存的困境带来了“主体的困境”“认知的困境”“能力的困境”以及“实践的困境”，这意味着儒学同当下实践的互动出现了裂痕，需要自我调适以适应实践的要求，儒学的主体需要摆脱经院哲学式的“伪话题”的缠绕，“用更多的热情、精力和智慧去谋划儒家思想服务现代社会的途径”（第354页）。李教授更进一步指明当今儒学应该肩负起四大使命，即“义理的梳理”“百姓的教化”“社会的批判”和“价值的落实”。要让儒学能够再次和实践进行良性互动，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对儒学的义理进行梳理，全面、客观地呈现儒学的义理体系，挖掘、展现儒学的当代价值，揭示儒学义理存在的

缺陷或问题（第447页）。经过对儒学义理的当代阐释，以此教化百姓、介入社会，最终让儒学倡导的价值在当代世界落地生根。四大使命密切相连，“义理的梳理可以为儒学的发展提供学术的依据，百姓的教化可以为实践儒学提供鲜活的对象，社会的批判可以为展示儒学精神提供方式，价值的落实则是儒学的终极目的”（第452页）。“四大使命”展现了当代儒学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它既是儒学面对新的社会实践做出的自我调适和自我转化，也是近代以来几代儒者不懈探索的合理的逻辑产物，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儒家“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当代表现形式。

二 不懈探测儒学的合理内核， 推进儒学义理的敞开

“四大使命”当以“义理的梳理”为基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儒学如果依然想成为介入社会的鲜活力量，就必须探寻其义理系统中的“合理内核”。同当代很多学者一样，李承贵教授在其几十年的学生生涯中，不断探测儒学的合理内核，推进儒学义理的敞开。李教授对儒学义理的梳理同他对儒学形态的省思密切相关。李教授以《易传》为中心考察了先秦儒学中人文智慧与自然的关系，以“性理”和“事理”来概括宋明儒学和清代儒学的不同形态，以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以及生活儒学来标示当代儒学五大形态，从不同的层面讨论了先秦、宋、明、清、近代以及当代儒学的具体形态，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历史形态的梳理。

通过对儒学形态的系统梳理，李教授对儒学的特质及其“合理内核”的认识也不断推进。李教授早期关注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在本书“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一节中，认为“儒学中的‘自然主义’是生机的而非机械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精神的而非物质的”（第28页，本节原题为《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及其特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已经暗示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其实统摄于人文主义。“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一节认为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儒学的一种形态，“然而，这些形态虽然可以成为儒学开展的一种方向，但它们并不能周全地回应某些关于儒学的质疑，并不能稳妥地解决当今儒学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尤其不

能创造性地为儒学的开展确立一种充满活力的根基”（第221页）。相比之下，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它作为儒学的本体形态，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生长之源”“开掘之匙”“学科化之果”以及“应对挑战之法”。李教授沿着人文儒学不断深挖，认为人文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形态在于其秉持“人文认知范式”，而正是这种认知范式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得到彰显。

“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一节是李教授不断反思儒学形态、梳理儒学义理进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它从人文儒学中拈出“生生”作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理念。如李教授自言：“所谓根本理念，即核心理念，它是一种学说或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轴或精神，是该学说或思想体系理解宇宙万物的根本方式，是该学说或思想体系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是该学说或思想体系的自觉追求。”（第3页）人文儒学和人文认知范式的成立都奠基于儒家生生之学，当李教授将“生生”专门拈出标示儒学思想的内在维度时，其对儒学义理的梳理方才逼近“根本”与“核心”。

三 深入反思儒学开展之现状， 助力儒学价值的落实

李教授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儒学的形态，另一方面聚焦于儒学的开展，在动静、横纵之间搭建起致思的时空架构。儒学开展同儒学之形态互为表里，儒学开展的结果在特定时代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儒学形态侧重于对儒学静态、横向的考察，而儒学发展则侧重于动态、纵向的考察。儒学之开展是儒学基本精神在面对时代不同的境遇时，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的过程。从李教授关于儒学当代任务的理解来看，对儒学形态的反思基本上属于“义理的梳理”，而对儒学开展的反思则与另外三种任务相关，思考儒学如何介入当代社会，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基于此，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开展有“生活的向度”“批判的向度”和“信念的向度”，此三大向度与“百姓的教化”“社会的批判”和“价值的落实”三大任务正相对应，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李教授理论的自觉性以及致思的一贯性。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李教授将“人文儒学”与“生活儒学”并提，因为二者标志了儒学的“形态”与“开展”的核心内容。李教授将前者称为

“儒学的本体形态”，将后者视为“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可以说，人文主义是对儒家思想理论形态的概括，此本体之价值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实和开展就表现为“生活儒学”。走向生活儒学由儒学自身思想基因所决定，也是儒学在当代发展和转化的要求，但是“生活儒学或儒学的生活化，是一项复杂而重大的工程”（第292页）。如何完成这项工程，实现儒学的生活化？李教授总结了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即“以身传道”“以文传道”“以事传道”和“以心传道”，这四种方式是传统儒学落实自身价值的具体路径，对儒学在当代的开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对儒学形态的反思相一致，李教授对儒学开展的反思最终也走向了生生之学。李教授认为：“‘生生’之为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不仅因为它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理念，更因为它具有伸展儒家全部主张与思想的要义，这些要义不仅是儒家‘生生’理念的清晰化呈现，而且使‘生生’意义得到淋漓尽致的落实。”（第7页）“生生”对儒学价值的落实就在于对所有生命存在的创造（“创生”）、养育（“养生”）、保护（“护生”）、成就（“成生”）、尊重（“贵生”）和圆融（“圆生”）。以“六生”为中心，李教授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纳入现代人生命存在之中，使得生活儒学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李教授关于儒学的形态与开展的思考最终都统摄于生生之学，如其自述：“（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后来突然发现实际上贯穿着一种清晰的脉络（当时令我惊讶不已），这个脉络就是从‘依人建极’（船山语）到生活儒学，再到生生之学。”（前言第2页）生生之学是李教授思想发展合乎逻辑的一个结果，它统摄形上与形下、形态与开展，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形态的轮廓。李教授近十多年来主要潜心于生生之学的思索，而将本书视为生生之学的“观念预备”，从本书展现出的当代儒学研究新的气象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次盛宴的开场。